

歐洲漢學史國際學術會議報導(上)

古偉瀛 林維紅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100-106

編按：本報導係本刊敦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古偉瀛以及林維紅兩位教授共同撰寫，其中古教授負責4月17日至20日中午的場次，亦即由開幕到魯惟一教授(Michael Loewe)的論文，其餘由林教授完成。

由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的這個會議是4月17日在圓山大飯店正式開幕，當天早上九點正由執行長李亦園院士正式致歡迎辭，以英文提到基金會的目標及此會議的意義，並以中文歡迎國內的學者，特別指出這次會議不發出席費不送會議包，要樹立一個開會的榜樣，隨後由瑞典的馬悅然(N. Göran D. Malmqvist)教授致開幕辭。他以英文說明了這個會議的籌備經過，並感謝在這次會議中出力的基金會工作人員，提及他目前所進行的將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及翻譯。最後並呼籲國際間進一步的交流及合作。

第一場的兩篇論文，是由德國慕尼黑大學資深教授傅海博(Herbert Franke)以及捷克的白利德(Augustin Palát)教授主講。首篇的傅教授由於健康關係，無法前來，改由其學生，現今亦為慕大教授的鮑吾剛(Wolfgang Bauer)代為宣讀，此篇為首篇，傅氏亦為德國元老級的漢學家，所寫的文章可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場白。文中指出希望這次會議可以看出各國的漢學研究是否會呈現不同的國家風格來。他指出漢學在十九世紀成爲一門正式的學術研究領域的背景，中國爲西方人所具有的永恆的吸引力，法國首創華語教學的經過，以及稍後英國和德國設立漢學教席的情況，當然這背後都有強烈的政治或經濟、宗教動機。早期的漢學家多爲從未到過中國者，許多也都是外交官、傳教士或駐華工程師等業餘人士，但都很有貢獻，

而早期的研究也多爲中外關係，少數民族等較外在枝節性的問題，其觀點也爲歐洲中心論。文中也談到中文的困難，西方漢學家都是在還未充分瞭解中文之前就得開始進行學術研究，有點像是「還不會爬就得飛」。並提到英文漸成了國際語言，以致小國家的學者由於不用英語表達學術成果，無法爲他人分享的困境。此外，還提到許多專業成果因經費不足而無法出版的遺憾。最後，作者提出呼籲國際間多交流，特別是與俄國的合作，並希望有漢學家能寫出一本具有經典性質的、能影響整個世代的漢學作品來。

次篇講題爲「從十九世紀末到今日的捷克漢學發展情況」，白教授指出捷克因其國家的位置及大小關係，貢獻並不如其他的英法等國，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樣，英文也的確構成了一個障礙。

文中指出捷克漢學研究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但在此之前的十九世紀末，捷克最有名的歐洲古老大學，創立於十四世紀的查爾斯大學就已出現了東方學家。早期學者多爲研究宗教及語言問題，例如德弗拉克(R. Dvorak)，他興趣太廣，無法深入，但也爲捷克人介紹了中國哲學及倫理，譯介了詩經及道德經，其著作「孔子的生平及教導」，今日仍有價值。可惜他並未有傳人，漢學消沉了一個世代。1918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合成捷克共和國，環境改善，1922年成立東方研究所，1927年任命了34位研究員，但其中並無一位漢學家，二十年代末期出版了「東方檔案」季刊，很快其水準就受到重視。1936年「中國協會」成立，展開了許多文化活動。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普魯西(J. Prusek)自亞洲歸來後，才成爲東方研究所中活躍的一員，而他的貢獻不但在於漢學研究，也在於訓練出一批漢學家來，納粹佔領時，學校雖被封，東方研究反而更趨團結。戰後1945年5月東方學者集會商討未來方向，普氏強有力的領導，遂形成了日後的「布拉格學派」，他首先是在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哲學系展開工作。

1947年成立了遠東系，他任主任，每年約有六到十位的學生。五十年代末期，東方研究所被併為捷克科學院，普氏離開大學前來主持此一新機構。另一重要機構是那普斯德博物館(Naprstek Museum)，建於1862年，中國的收藏頗富，有一兩位專職漢學家駐館，1963起出版年刊。國家藝廊也藏有許多中國陶瓷及近代繪畫，也有專任漢學家駐館。另外任用漢學家的機構也還有幾處，如國際政經學院，語言學院等，甚至一個工廠的對華市場行銷人員也受中文密集訓練。此外在斯洛伐克地區也有一些漢學家，如在布拉提斯拉瓦的孔門紐大學有些漢學家在東方研究系任教，這些人早期都是在布拉格查爾斯大學訓練出來的，這批人研究的焦點以文學為主。在普魯西的領導之下，約二十年之久，直到六十年代末期，十五位學者從事歷史，古今文學以及語言語音學的研究。也在此期間，建立了有名的魯迅中文圖書館，今約有66000冊藏書，在六十年代訂閱雜誌期刊數達307種，如今只有26種，文中用相當多篇幅敘述普氏的學術生涯。普魯西先去瑞典向高本漢學習，後又到德國，先後從Haloun以及E. Hanish遊，1932年來亞洲，先在中國住了兩年半，研究民間文學，後又接觸文言文，1934年到日本，使其原先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更有助益。1937年回國後不幸遭逢納粹佔領，他被迫中斷所有的國際關係，只有在戰後，他才開始有系統地為捷克漢學打下基礎。他的代表作是「中國歷史與文學」(布拉格，1970)，他參與亞洲作家人名辭典的編纂，並翻譯了不少，如魯迅的「吶喊」，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劉鶚的「老殘遊記」，「孫子兵法」以及「論語」等。另外，他也寫了一本從1400到300B.C.的華夷諸國，可見其方面之廣，可惜他是用捷克文寫作，不為外人所悉。而其所教導出來的學生在漢學各方面都有後繼者。遺憾的是由於政治上的因素，1949後其研究走中國大陸的路線，而在1968蘇聯入侵後更複雜，漢學的學生很少，在東方研究所的頂尖學者大部份都離開，不然就是不准研究，所能作的只是為中央政府準備中國政情的報導，也因與中共關係緊張及捷克政權的嚴格查禁制度，使得出版幾乎不太可能，有些只好偷偷運往國外出版。目前情況改善很多，在東方研究所，由法思(J. Fass)領導，有十二位漢學家，在查爾斯大學則有七位專任教員，學生也從1990年後多了起來，目前約有40位；其他的大學及博物館的活動仍與昔日大致相同。總之，捷克漢學多少還是對世界漢學有所貢獻的，而國際同仁間的支持合作都幫了不少忙，希望今後能繼續在合作的氣氛下對中國有進一步的瞭解。

第二場主講人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蒲立本(

Edwin G. Pulleyblank)教授，講題為「歐洲研究中國語音學的第一階段」，文中特別提到瑞典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ard Kalgren)的貢獻，說高氏之研究開了一個新的階段，在語音學方面可以用B. K.(前高本漢時期)以及A. K.(後高本漢時期)來分。此文乃介紹歐洲學者對音韻學研究的情形，特別是高氏對「中古音」的見解。漢語音韻一般可分為上古音韻及中古音韻。前者是以「詩經」以及「說文解字」為基礎；後者為隋唐音，有切韻及廣韻。蒲氏指出高氏之學有承襲西方歷史語言學的傳統；也有受到一些漢學家如伯希和(P. Pelliot)提供資料、馬伯樂(H. Maspero)對於中古音系的看法、以及特別是尚克(S.H. Schaank)的音韻四等分別中顎化理論(yodization)的影響。蒲氏在文章中提到高氏雖有貢獻，但也有不少錯誤，有華籍的趙元任、李方桂等研究都指出其誤，但並不為高氏所接受。在討論時有人指出高氏之所以堅持己見並非固執，很可能是自己的研究已到了一個地步，不願意去回顧，也沒有體力去進一步檢討。有人指出俄國在這方面的成就，但本文中只提到一位。蒲氏說，此文只處理第一階段，而且畢竟俄國學者也提到了。

下午首位主講人是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講題為「歐洲人對中國及東南亞的關係——以及當地華人之研究所做的貢獻」。這篇文章分為殖民時期以及後殖民時期兩大部份，他指出了在殖民時期的主要研究者，其中有荷蘭人，英國人以及法國人，也有一些研究是與殖民地沒有直接關係的，例如，英、德學者對東南亞華僑、中外交通史、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以及中國邊疆民族的研究。後殖民時期則有一改變，變得比較具有國際色彩，隨著歐洲人的角色逐漸減少，而美國、日本及中國學者愈來愈活躍。在此時期不再以國別來討論研究概況，而是分成四個主題，一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二是南洋華僑，三是社會、社區以及宗教的研究，四是語言文學以及教育的研究。此文中對於華僑的研究最為有趣，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歐洲學者所使用的文獻以及碑刻材料的摘要。本文也提供了一份頗佳的書目。在討論時有人提到一位早期在東南亞的歐洲人J. A. Mills，他的資料目前藏在劍橋的李約瑟中心。戰後的美國學界多半將研究範圍集中在戰後的社會研究上，如Jamieson對於吉隆坡的研究。也有人問及有關中國西南及東南少數民族的研究。作者稱這並非本文的範圍，但有關該主題的研究則有英法傳教士，特別是在1950年代有不少著作。

其次是意大利羅馬大學東方研究系的白佐良(Guiliano Bertuccioli)教授，其講題為(意大利的漢學研究：1600—

1950)。首先第一位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他寫了一本當時最好的有關中國地理、歷史、哲學、宗教、國家組織以及社會習俗的書；此外，還有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以及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方濟各會的 Basilio Brollo (1648-1704)。衛氏寫了一本「中華新地圖」，提供中國的地理及歷史知識。衛氏著作中所敘及的滿洲入關史實較不受漢人的種族偏見所影響，殷氏則是將儒家經典首次譯介紹給西方的學者。Brollo 則是首位編成完備的漢字——拉丁語字典的學者。最後一位傳教士變成漢學家的是德禮賢(Pasquale D'Elia 1890-1963)。他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最重要漢學家。在討論問題中，有人問有關 Motucci 當年所搜集的中國文字的下落，作者並不知。許理和教授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等人的漢學研究的貢獻可否算是意大利的貢獻，因為這是該修會的團體成就，應該是整個跨國修會的貢獻。有一位學者更指出利氏自己看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意大利人。更有一位學者提到馬可李羅到底來過中國沒有的問題，前兩年在歐洲有人提出這種疑問，因為馬氏所提到的中國辭彙都是波斯語，有人懷疑他未到過中國，只在其他國家，但也有人以馬氏所提到的幾次戰役為證。

第三篇主講人也是意大利學者，蘭喬蒂(Lionello Lanciotti)教授目前任教於意大利中東及遠東研究所，其講題為「從1945年到今日的意大利漢學」。此文提供我們最新的意國漢學近況。作者提及在意國對於中國文學重新出現的興趣，以及持續地對中國歷史，宗教以及哲學的研究熱忱。文中並提及目前科學史，特別是道教煉金術的研究盛況。討論時有人提出在意大利財政支援的問題，正如其他國家一樣，財力支援多少與國家的利益有關，意國是在與中國大陸建交後，其貿易機會的刺激下出現了對中國的興趣。戰後的意大利只有兩處可以學到中文，一是羅馬大學，一處是在那不勒斯的東方大學，該大學是1732年馬國賢神父(Matteo Ripa)所創設。這些機構教師少，圖書更不夠，學生屈指可數。有些人繼續攻讀漢學，其成就即是本文所探討的內容。白佐良教授早期擔任外來官約四十年之久，與中華文化圈並未脫節，故能繼續從事漢學研究。作者本人則在畢業後遠赴瑞典從名漢學家高本漢遊，後又至荷蘭的萊頓大學當杜聞達(J. J. L. Duyvendak)的學生。有人則移民他國。今日則有兩位教授中國文學及語言的教席，一在羅馬大學，一在威尼斯，由作者的學生薩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擔任教授。第三位是作者本人，在那那不勒斯的東方大學任中國哲學教授。此外意國

還有14位中國文學語言副教授的位置。當然還有數十位與漢學有關的教職。除此意國還有一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ISMEO)開設中文課程。這些數據都顯示超越歐洲中心論的眼光，純粹出於文化上的需要。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漢學較有成就的是在中國語言學、歷史、宗教、哲學、考古以及藝術史、科學史和翻譯作品等方面。其中有字典的編纂，甲骨文以及敦煌學、新聞用語辭書、唐詩、「浮生六記」的翻譯，從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渾的歷史，威尼斯大學還有滿洲的研究；白教授與一批學者從事道家研究，更有人研究朱光潛、煉金術。更值得一提的是與港大中文系合作的「中華歷史與文化百科全書」的編訂計劃。三所大學的定期刊物也都發表了不少漢學研究成果。總之，意國漢學起源最早，却也是最近的學科，自利瑪竇之後，經歷了「黑暗期」，近數十年才再度重生，作者認為他們這一代漢學家在歷史上將被視為早期的開拓者。

4月18日上午首篇由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主講「荷蘭的漢學：過去，現在與未來」。作者陳述了荷蘭漢學的源起、中衰、復興以及目前的情況。文中的主旨在闡明荷蘭漢學界的偏重實用之特色：它總是與殖民有關。漢學家之訓練也為了將來在殖民政府任職之用的。因此，以前研究的重點在法律、文學以及語言。所要的人並非「中國通」而是「華僑通」。1876年萊頓大學開設了中國語言及文學的教席，首位教授是施樂吉(G. Schlegel)，他的就職演說題為「論研究中文的重要性」，他認為這不但會嘉惠印尼的華人，也可增加殖民政府的收入。更重要的發展是1890年「通報」的發行，此後一直都是由一位法國以及一位荷蘭學者共同編輯，歷來都是名漢學家，不但文章水準高，連書評都很受稱道。荷蘭漢學因狄格羅(J. de Groot)的去職以及與包雷(H. Borel)的阻礙而中挫，1919年才再由杜聞達(J. Duyvendak)復興，此人很博學，研究過的包括印刷術、王陽明學說、梁漱溟、新文學運動以及張勳；他也譯過荷文的「道德經」以及中西接觸史。他不但有國際聲望，也指導過許多論文，後出版於有名的「萊頓中國叢書系列」(Sinica Leidensia, 1930創立)。印尼獨立後，許多殖民官員轉入外交部門服務，也有人繼續從事業餘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羅佩(R. H. van Gulik)，他所研究的是當時忽視的中國文人的嗜好等文化史的題材。而時至今日主要的問題變成了日趨學術分工化的問題。與傅海博的意見不同的是，作者認為分工化有其必要性。作者並指出在荷蘭今日所沒有加以研究的漢學領域有中國古代、唐、宋朝以及藝術史。而古典中國文學的研究也似乎在衰退之中，大部份

的學生集中於研究當代中國。

次篇為任教於法蘭西學院中國研究所的施博爾(Kristofer Schipper)「歐洲的道教研究：其貢獻及影響的調查」。此篇文章將歐洲道教的研究溯至歐洲漢學的最初階段。所提到的人有十九世紀漢學初興時的雷暮沙(J. Remusat)，儒蓮(S. Julien)以及理雅各(J. Legge)。雷氏首先介紹道家思想，儒氏則出了一本「道德經」的極佳譯本。作者認為理氏是超越歐洲中心論的人，理氏所提出的問題今日仍有其意義。其中包括了道家的起源，老子的真偽，道家思想的傳播等等。又將二十世紀的道教研究分成兩期，前期指五十年代以前，當時主要的研究者，是沙畹(E. Chavannes)，狄格羅(J. de Groot)，葛蘭言(Marcel Granet)以及馬伯樂(H. Maspero)；德國有海克曼(H. Hackmann)，韋理查(R. Wilhelm)以及鄂喀思(E. Erkes)；英國有翟爾斯(L. Giles)以及偉列(A. Waley)的翻譯；在這階段首次見到「道藏」的譯介。研究上以馬伯樂貢獻最具劃時代意義。而在五十年代之後則有葛蘭言的弟子史廷(R. Stein)和卡登麥(M. Kaltenmark)，此篇作者施博爾即是卡氏學生。最後作者指出當今在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道家或道教著作。同時作者也認為歐洲的道教研究不再是一種孤立的個體，特別是美國學者在戰後與日本及中國學者之間的合作，成果可觀，現已擴成世界性的學問。

第三篇為鮑吾剛(Wolfgang Bauer)教授的「歐洲的滿洲研究」。此文主要是談到歐洲漢學界對滿洲的研究，也談到今日的情況。全文共分為五大部份，一為通論，提及滿洲研究應該是語言學和歷史學兼備的。二為尋求有關中國征服者的資訊(約1650—1850)，在滿清尚未征服全中國時耶穌會士已把滿清入主的消息在歐洲出版了，其後還有不少同會士描寫滿清的政治及文化情況，如皇帝的巡狩等。十八世紀後耶穌會在華沒落，但有法人繼續研究，其書還譯成俄文，在俄國在彼得大帝東進後也很重視滿洲研究，十八世紀末就有「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的譯本，而在滿洲語方面也是在十七世紀末由耶穌會士引入西方。此期的滿洲研究以法國為主，也有俄德學者。三為對即將逝去的文明之著述(約1850—90)，此時期清朝由衰弱到覆亡，但東北滿洲却日形重要，外人對其興趣日增，成了日俄角逐的地區。滿文在中國却日趨沒落。不過也因清之中衰，使得外人有機會看到一些從前見不到的檔案，如日人內藤湖南在瀋陽發現的入關前檔案，以及「滿文老檔」，大有助於滿洲之研究。十九世紀後半葉在歐洲滿文

的知識大進，法國學者 C. de Harlez 做了很多研究，俄國則編了不少字典，也以其地利之便，從事滿語的語言學比較研究。俄國的影響也及於德國的滿洲研究，學者有 W. Bang, E. Haenisch, E. Hauer 以及 W. Fuchs，最後的這位 Fuchs 是一位滿洲書目專家，他教了一批戰後的歐洲學者。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大，滿洲國成立，雖與滿洲研究無直接相關，但有學者如法國的 L. Gilbert 也出了介紹滿洲的書。四、朝向一新的學科邁進(約從 1950 起)，中共建國後，許多學者被迫離開，中途放棄滿洲的實地研究。幸好臺灣還有一些研究的可能，尤其是 1969 年「舊滿洲檔」的刊印，比以前的更有價值。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西方學界只好在圖書館中研究其所藏的滿洲文物，並且也致力於書目及史料現況的調查。俄國及匈牙利在滿文語言學界仍是領袖羣倫。M. Gimm 從中文來研究滿文，而 G. Stary 著作甚豐，也有人在黑龍江及新疆研究殘存的說滿語的部落。五、未來展望。在滿洲研究中有兩大研究方向：一是滿文與通古斯語言的關係，一是滿洲與中華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將來滿洲研究也端賴於政治、社會潮流而有變化。雖然，今日在德國、意大利仍在講授滿文及其文化，但已無此類的講座。不過，在歐洲的滿洲研究絕對沒有消失，反而出現了生機。

下午首篇為「中文語法分類學」，主講人為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伊索倫(Søren Egerod)，這篇文章的原文題目只有一個字，是最短的一個題目，叫 Typology。通常在語言學的比較上，一種是類型(typological)，另一種是發生學(genetical)的比較。此處探討前者，亦即以文字的結構作基礎來從事分類。最典型的分類有四種：孤立型(isolating)，即字型不變化的；黏著型(agglutinating)，亦即規則的字型變化的；字型變化型(inflecting)，亦即不規則的字型變化；以及複合成型(polysynthesis)，以字和句的合成為特色。此文即是以中文來探討分類學的一些問題。在中文語法分類學上最重要的一位是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雖不是一位漢學家，但頗有天份。洪氏認為中文文法不是以一般文法的範疇為基礎的，與其他語言相反，它只有文法，而沒有語形學。其次的一位有貢獻的是英國教授 Terrien de Lacouperie，他按照動詞—主詞—受詞的位置將中文的發展分為五階段，從主詞受詞動詞的形式，如「天下未之有也」「王其德之用」，到動詞—主詞—受詞，再到受詞—主詞—動詞(如書我賣了)，最後轉至主詞—動詞—受詞，而且所有格等修飾語都放在名詞前面的形式。換言之，Lacouperie 主張中國語文是從阿爾泰／西藏表意語言中發展，經過一

個類似馬來語的階段，再進入另一種西藏語系的形態，接著到一濠／泰階段，最後演變成今日漢語。文中提到在法國二十世紀漢學家中，對於中文語法分類結構最有概念的人是馬伯樂(H. Maspero)，他將中文文法的關係減化為兩個，決定形及方向形(determination and direction)。另一位這方面的專家是日內瓦大學教授 Henri Frei，是第一位將中國官話的分類提出一個較佳的架構的學者，他也寫了一篇很常被引用的文章，即將中文裡「把」這個字的所用到的句型詳加探討。認為在印歐語系中含此字的句子結構無法翻譯得完善，因為在此種結構中主詞一受詞的分別並無意義(如把你手都凍了；把他爹病了)。最後作者指出「楚辭」一書「離騷」中一些受到可能是泰國語法之影響的句子，如「高余冠之岌岌兮」，「高翱翔之翼翼」。在討論時，蒲立本教授提到他也正在寫 Typology 的題目，不過，的分類學是指語音的分類學，而非此處的語法。

次篇為法國高等師範學院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ère) 教授主講「歐洲學者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研究中國的一些主題」。作者在本文中探討歐洲漢學界、社會科學界、以及中國學界本身三者間的關係。此文是在本次會議中少有的探討歷史哲學的一般性題目的文章之一。文中指出在十八世紀最受注目的漢學著作一是竺赫德(J. du Halde)在1735年介紹中國的著作；其次是馮秉正(J. de Mailla)對於「通鑑綱目」的翻譯。由於西方對進步觀念的重視，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就由正面轉成了負面。十九世紀漢學初興之時，是藉由文學及語言之研究入手，有四個研究主題：一是中國文明的起源；二是中國邊疆人口及中亞部落的研究；三是中國歷史延續性的研究；四是討論中國歷史中較永久的一些現象和中國社會的原始特質。1850後漢學研究受到在華的「實用漢學家」的加入，聲勢更為浩大，這些人多半是外交官，傳教士或海關職員，在中國人的協助之下，有很大進步，而且當時對於時事的研究也是一個特色。不過這些成就都不為當時的西方學界所吸收，寫世界史的人都不把中國文明當作一回事。倒是歐洲社會科學家或思想家却將中國視為非正常發展模式之一種文明，馬克斯就稱之為「亞細亞生產模式」，但這些並未與漢學家有何互動之關係。而在漢學界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有了突破，新的人才，較嚴格的學術訓練以及更好環境的研究，再加上新的史料和中國學者的合作，對古典中國的各層面展開研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社會科學的衝擊，中國學者拿其歷史來與西方比較，經濟和社會史漸受重視。中西漢學家都在回應社會科學的挑戰

，且互為影響，使得中國文化較易與其他文明作比較。不過，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却忽略了與當代中國的研究相結合，因而在解釋上有許多理論不切實際，其後半葉美日漢學家補足了此重大缺憾。在討論時傅吾康提到他的父親富圖閣(Otto Franke)當時也很注意到近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親身經歷過戊戌政變，對於梁啟超特別有興趣，他所編的文集，以及「通報」的論文也都有一些近代的東西。所以剛剛提到的二十世紀初對於近代中國的研究較少，而這是一些例外。

第三篇則為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講題為「西人研究中國語言的早期歷史」。這是一篇歷史的回顧，集中在早期語言學及文法的著作。本文分為三部份，一是西方對於中國語言學正式研究之前的情況，從十三世紀的 William of Ruysbroek談起，早有人注意到中文的特色，並抱怨其難學。耶穌會士是最早掌握中文知識之人。利瑪竇曾向歐洲友人談到中文的書寫特色，A. Kircher則想將中文納入他的世界一元語源的理論體系中，認為中文源自埃及的教士。但中文的困難是無可爭議的，有人說中文是魔鬼所發明，用來阻礙福音在東亞的傳播。此節提到探討中文的諸家學者，如 F. Godwin, J. Webb, J. Nieuhoff, J. Gohl, A. Semodo, J. Golius, Leibniz, 二是探討早期的中國文法。主要認為在十七世紀時中文之研究多屬揣測，也因缺乏具體的資訊而受到阻礙。三是分析十九世紀文法研究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中對中文文字性質的主要爭論仍屬時代性，且爭議頗多。總之作者主張吾人仍無法確知古典中文的讀者有否真正瞭解文中的思想，爰是，吾人仍須要有(但仍尚未有)一本好的中國古典語言的文法書。作者覺得在這方面並沒有進步的感覺。作者對自己事先有的預設或成見十分敏感，視之為「吾人瞭解中國歷史時特別容易歪曲之處，我們也患了某種程度的歷史盲目症。」

4月19日為休息日，當天並無論文宣讀，倒是主辦單位安排了南管及布袋戲的演出。

4月20日早上首篇為荷蘭的著名漢學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宣讀「論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士研究」。許氏指出，研究此時期在華的耶穌會士是中外關係史上極有意義的一頁，尤其是中華文化與文藝復興後的歐洲高層次知識份子之間的交流，稱之為「耶穌會士研究」或「早期傳教士研究」都有不妥。因為，這也牽涉到中國人士的思想行動，也包括了傳教士對西方科技的輸入，故應該稱之為「西學」。此名詞可包括神學、道德、科技及藝術

各方面的交流。此題目之有其意義並不在於中國皈依者衆（事實上，不到千分之0.25），也不是其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禮儀之爭後耶穌會在華就式微了），而是因為有關的史料不但豐富而且多元。作者討論了許多中西文的各種資料。相關的西方資料方面：第一類是由耶穌會士送到羅馬的資料，這類資料為內部參考之用，本來不是為外人所寫的，其中有關明、清兩代的為最多。另一類是為外人或是為傳教工作所寫的，此類資料多半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中文方面的資料也有三類，一類是由耶穌會士自己所寫的，單單在十七世紀就有320種；另一類是由信徒本身所寫的，寫法較不受拘束，可以見到中國文化中包容的一面；還有一類則是由反基督教人士所寫的著作，可看出文化衝突之處。文中提到最近二十年來研究重點的改變，以前多為耶穌會士自身的研究，或探討傳教方法、組織等，是傳教取向，且以歐洲為中心；現在則從中國士人對基督教負面或正面的回應之研究了。其中如謝和耐(J. Gernet)以及鍾鳴旦(N. Standaert)就是最好的代表。在討論時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類作品資料已成了儒家／中國社會的限度及彈性的一個測量標準。這對在華西方人士的回應上，不管是正反兩方，都可看出儒家社會如何接受異國文化，以及其限度。

第二篇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歐洲現代中國文學之研究」。雖然作者目前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她顯然是屬於捷克學派。文中指出歐洲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可分為二個時期，第一期從192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西方學者個人受其本國及文化背景影響，對中國現代文學之起有很不同的研究途徑；第二期是從1950初到1970年代中葉，此期對於中國及歐洲的新政治態勢有了很劇烈不同回應；第三期是從上期末到今日，由於有國際間的合作，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最早的研究是在1926年俄國漢學之父亞列謝夫(M. Alexeev, 1881-1951)，他研究中國詩的改革，特別是對於胡適的白話文改革，但在研究了胡的「嘗試集」之後，他認為胡氏詩中創新之處很弱，談不上什麼革命。第二位早期歐洲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是捷克的普魯西，他1932年在中國親身觀察了中國文壇，寫就了「中國新文學」一文，返國後繼續將其文章發表在柏林國民黨資助的刊物「新中國」上。普氏與胡氏觀點相反，他將晚清民初文學看成與傳統文化相接續，而非斷裂。比起上述二位，傳教士的研究就顯得較不够專業化了。第二期由於中蘇關係看好，莫斯科、布拉格就成了很有活力的漢學。研究環境十分有利，蘇聯學者常可訪問中國又得了許多材料，年青一輩追隨亞氏後塵，有成的有

N. T. Fedorenko, L. Z. Ejdlin, V. F. Sorokin, S. D. Markova，不過這些研究今日來看已失其光輝，因為多為蘇聯大眾閱讀之用，十分誇張及意識型態化，學術價值不大。1958中蘇的絕裂及1960年代文革的動亂使情況有所改善。上述的年青學者有了檢討的自覺，在1960和1970年代這些人出了好的研究，只不過如今他們換了新的範圍。1980年開始有人研究戲劇，唯一遺憾的是並未見年青的漢學家接棒。

在另一方面捷克走了另一條路。普魯西在各種條件配合之下，有三方面系統性的成果，一是他在1950正式訪問中國使他與老友重聚，其中不乏位居要職者。他也買到了六萬冊以上的有關現代中國文學早期刊印的書。其次，普氏教出了一批具有工人階級背景的青年漢學家；第三他安排了學生在各大學術機構任職，其弟子包括作者本人形成了「布拉格學派」，此派有二特色，一是揚棄馬克斯的文學理論，一是尋求研究策略，而其觀念或方法上又有二特色，一是將文學視為一歷史過程來看，一是將文學視為一種藝術。但在蘇聯入侵後普氏被迫離開東方研究所的主任一職，其後五年受到迫害，但另一漢學中心布拉提斯拉瓦却在1968以後開始活躍起來。第三時期政府機構不像五十年代那樣支持，但經由國際合作，特別是西歐的協助，獲了成就。有名的如D. Fokkema（蘇聯的影響），David Pollard（周作人及新文學理論）、B. Eberstein（戲劇）。各種國際會議也促成了更好的合作。唯一遺憾的是在四冊「中國文學精選導讀，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中，並沒有近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較可靠書目，作者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書目。

第三篇為英國李約瑟研究所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中華早期帝國史——西方學者的貢獻」。此文回顧歐洲學者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文中首先感謝歷代中國學者的努力以及現代華裔教授在歐美推廣中國研究，使其成為無法忽視的學科，也感謝日本漢學家的研究貢獻。隨後，作者認為中國文化已不再被視為停滯不前，或是一朝接一朝的循環而已。研究古代中國史的西方學者一開始就瞭解一個困難，亦即他們得過分依賴單一史料，——「正史」。為了要彌補此缺憾，學者利用近二十年來的出土文獻去驗證及修正前人的說法。而全國各地考古材料的陸續出現也被用來以跨科際的方式進行重建過去的工作。除了因數據不足不易量化以外，研究上古中國的史學們與別科專家合作，分析史料，並超越了朝代興衰的重點研究，也注意其他社會、經濟層面的探討。在史學觀點上西方史家特別警覺到的有下列數點：1. 早期史學著作中有那些是

用來傳佈國家政策、灌輸道德教條及褒貶主張的。2.斷代、編年兩種體例都無法說明發展的過程。3.儒家理想國的意理讓人產生錯覺，故西方史家致力於釐清原始儒家以及漢代以後的轉化；也想從新出土的資料探討黃老及道家的真面貌。4.大一統的觀念其實在秦及漢初並未流行，中央與地方的緊張以及一元多元的衝突可在西漢及東漢的歷史以及道佛與儒家的關係中看出。5.漢朝事實上受秦朝影響甚大，不但在制度上，也在治國理念上，法家思想在漢朝與儒家並列為治國原則。6.西方史家為秦始皇及王莽平反，前者為中國制定一套統治全民的法律架構，後者為儒家傳統在朝廷的地位打下基礎。7.或許受到羅馬以及歷來中國尊重政制的影響，西方史家很重視皇帝制度及政府機構的研究。8.漢武帝政策以及敦煌、居延文物之重現使人可重建漢代部份歷史，尤其是軍事行政方面的知識。9.碑刻及馬王堆出土文物也增加了不少瞭解。10.在政府理論如天

命說及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而後者受到考古材料的大量資料的支持，在藝術史方面的研究也很受注意，如絲畫及武梁廟的研究，不但研究藝術，也探討社會變遷。11.思想統制的歷史、古文經學的倡導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等。

總之，西方的中國上古史家將秦漢看成連續的變遷時期，為後代奠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也有所修正，其過程並不平順，也有皇權與大族之爭等，但總是演變的意義較大，漢朝所定下的基礎令後世之人懷念。文後並有附錄，將研究上古史的西文書目分為十一類。在討論時有人提出對儒家在漢朝及其後的儒家要從發展的觀點來看，不能一視同仁。也有人在聽完此講後感覺漢學研究實在還是一種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有的認為是英文，如此，所研究的成果才能與國際學者分享；也有人認為是中文，因為到底講中文的人世界最多。

本刊歡迎學人或學術機構惠賜以下各項消息：

- 機構、學校、團體的研究計畫
- 舉辦的學術會議及宣讀的論文目錄
- 新近出版的論文集目次（個人論文集除外）
- 新近出版的參考工具書介紹

如蒙提供，請在8月1日前賜寄：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漢學研究通訊編輯部收。
